

实施军民融合战略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访上海财经大学陈晓和教授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66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军地双方、各行各业均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一些矛盾不容回避,一些问题也毋庸讳言。为此,笔者近日专访了国防经济学家陈晓和教授。

陈晓和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会副总干事,是中国国防经济学 2017 年度人物获得者。再次见面,我们没有客套话,陈教授直接谈起了他关注和研究军民融合的缘由。

2004 年,陈晓和从海军指挥学院转业到上海财经大学,担任国防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国防经济是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的,其目的是优化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提高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军民分离的体制机制,不利于优化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提高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于是军民融合便进入了陈晓和的视野,并成为他们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

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陈晓和直言说,实施军民融合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

理论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理论支撑问题。目前,我国军民融合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难以支撑、指导和引导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势在必行。首先,要加强军民融合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什么是军民融合?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军民融合?即研究军民融

合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如何研究军民融合?即军民融合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它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其次,要加强军民融合应用理论研究。主要包括:(1)军民融合需求理论。即军事和民用分别有哪些需求?其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需求如何确定?(2)军民融合供给理论。即如何解决军民融合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问题?如何构建军民融合的科研、生产和服务体系?(3)军民融合供需平衡理论。即供需的规模不平衡和结构不平衡是什么造成的?如何实现既定条件下和变动条件下供需的规模平衡和结构平衡?再次,要加强军民融合管理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管理的目标任务、管理的体制机制、管理的规范程序、管理的方法手段和管理的主体客体等。

实践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现实问题。就院校而言,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成果认定等方面。首先在学科建设上,军民融合最重要的支撑学科——国防经济正面临生存危机。一方面,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亟需国防经济等学科提供理论支撑;国家的军费预算每年都在大幅增加,对国防经济人才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军地却在大砍国防经济学科。比如,国防科技大学、空军勤务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等皆是。其中,空军勤务学院的国防经济学科曾经是江苏省重点学科,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防经济学科 2017 年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名全国第三,皆未能幸免。这就造成了需求越来越旺盛,供给越来越不足,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国防经济学科大量削减,军队院校主要是因为这些院校没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地方院校主要是因为这个学科在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中是小学科,入不了学校和院所领导的法眼,甚至认为它会影响学校一级学科评估和一流学科建设,根本不看这个学科有无国家需求和市场需求。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学科开设于 2004 年,



2007 年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名全国第一。学科开设以来,培养的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业率 100%,深受用人单位好评。多名硕士生、博士生获国家奖学金,被评为上海市和上海财经大学优秀硕士生和博士生。万方网上有 15 篇国防经济专业的博士论文,其中上海财经大学就占了 9 篇。就是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科 2018 年也被学校取消了,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次在人才培养上,军民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研究生招生,军队院校不招地方生,只招现役军人;地方院校不招在职人员,尤其是现役军人。以前军事经济学院、南京政治学院等军队院校是对地方招生的,后来反而不招了;以前,上海财经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地方院校是招收在职人员和现役军人的,现在也不招了。这样的倒退使生员质量大下降,从而造成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再次是成果认定上,存在歧视和偏见,使得从事军民

融合和国防经济教学与研究的地方院校学者难有高质量成果。军民融合和国防经济是交叉学科,涉及军事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研究难度很大。加之保密等方面的原因数据很难获取,有些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即使有数据有时也不能在公开刊物发表,只能在军内刊发。军内刊物是有核心期刊的,他们在军队内部等同于 CSSCI 期刊,但是地方院校不认。在地方院校,绝大多数学科都有 A 刊、B 刊和 C 刊。只有军民融合、国防经济等几个涉及军事和国防的所谓小学科没有,使得人才引进、教师的职称评定和晋升,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这些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军民融合和国防经济人才的培养,影响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影响富国强军目标的实现,必须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陈晓和教授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在学科取舍上,必须

全国一盘棋,不能由学校、院所某些领导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轻率决定,特别是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的重要支撑学科更应如此。学科建设涉及一级学科也涉及二级学科,争创一流学科,一级学科要争创,二级学科也要争创,不能顾此失彼;同样学科建设要造峰也要填谷,不能光填谷不造峰,也不能光造峰不填谷。一个学科的比较是国际国内同学科之间的比较,而不是一个学校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不同学科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个学科的取舍,要看它是否优秀是否一流,更要看它是否有国家需求和市场需求,两者不可偏废;同样一个学科取舍,要在国内同学科之间进行,而不能在一个学校不同学科之间进行,不然就会做出错误、荒唐的决定,导致好学科被淘汰,寿学科被保留。以致学科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同质化发展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错位竞争的局面难以形成,致使人才培养上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其次在人才培养上,必须摒弃军民分离的体制机制,形成军地院校同招共育人才的新格局。要做到这一点,中共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办公室就要会同军地院校主管部门,对包括招生在内的一系列不符合军民融合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进行清理,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使人才培养真正建立在军民融合的基础上。再次在学术成果认定上,军地双方必须统一认识,统一标准。不能完全按照地方标准实施,无视涉军学科的特殊性和保密性要求。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办公室有必要会同军地教育和科技部门将军标和民(地)统统一起来,包括对高校学科体系建设评价必须将国防经济学纳入评价指标、国防经济学术成果认定标准单列,并以此建立军民通用的国家标准。只有这样,影响国防经济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军民融合和国防经济人才的培养、影响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影响富国强军目标实现的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当前宏观政策破局需要新的城市化战略

■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

66 在过去几年,国家一方面限制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又对三四线城市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刺激。如果当前宏观政策要破局,则需要把政策的方向适当调整,让中国的优势变成更强的优势。

一、如何看待贸易战及目前国内宏观经济中面临的风险

贸易战背后暴露出很多问题。实际上在 2017 年这个时候,中国香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中美贸易冲突问题,那时候美国的研究报告,无论是来自智库还是华尔街,都已经开始指出这些风险。但是在大陆这边,无论是政府机构、政府智库、民间智库还是证券研究所,对此类研究几乎没有覆盖,这是我当时感受到的一个巨大反差。在宏观政策上,国内对贸易战的很多准备工作可能做得并不充分,比如在 2018 年 2 月份美国拉开贸易冲突序幕的时候,国内在货币政策方面,去杠杆的进程并没有放缓,甚至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这就导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尤其第二季度,国内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矛盾。

现在来具体谈谈贸易战。首先贸易战(或中美贸易冲突)本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多方面复杂问题的长期积累,也正因为问题的多元性、复杂性与长期性,我们不能指望在短短几个月内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市场需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对中美贸易问题真正达成协议保持一定的耐心,不排除在特定的时点中美贸易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其次我们来看贸易战对贸易的影响。从目前的宏观数据来看,该影响暂时是正面的。以 2018 年 9、10 月这两个月的贸易数据为例,出口同比增长在 9 月份为 14.4%,但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较高增速。因为 2017 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全年增速是 7.9%,全球经济增速在 3.5—4%之间,出口增速是现在国内名义 GDP 增速的 1.5 倍左右,是全球的 4—5 倍左右,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大环

境下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我看来,为什么贸易增长目前这么强劲以及未来会怎么走,肯定是宏观研究者和投资者接下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从 2019 年年初开始,出口增速会面临较快下滑的风险,但一两个月内因企业抢出口与环保限产相对放松等原因会保持相对平稳。至少现在我们可以说,贸易战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体现在贸易上,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从投资者对于经济增长、政策、汇率、市场情绪各方面都要有提前的估测和充分的准备。

除了贸易摩擦和未来可能的出口下滑,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相关的风险。2018 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四方面:

一是信用扩张乏力。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往往信用扩张三年之后,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信用扩张的平台期。2018 年是雷曼危机后的第十年,2008 年雷曼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开始信用扩张,2011 年 9 月份出现问题,间隔了三年左右;上一轮信用扩张是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正好也是三年。三年这个数字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多信贷资产的平均期限是三年左右。2018 年本身就处于信用扩张的平台期,再加上 2017 年底开始强化的去杠杆,信用的有些方面和渠道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从细节来看,过去几年无论是国内的公司债市场还是海外的美元债市场,其实都有明显的扩张;股权质押、P2P 等新型融资渠道也有了快速发展。过去几年央行通过补充抵押贷款(PSL)来进行的信贷宽松也非常值得关注。央行从 2014 年开始引入 PSL 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并从 2015 年起将其与棚改货币化结合,明显加快了 2015—2017 年的信贷扩张步伐。2015 年是信用扩张的一年,到了 2018 年,即使没有去杠杆,经济本身也会因进入信用扩张的平台期而面临一些问题,去杠杆只是使这些问题来得更快、影响更大。

其二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中国 2015 年开始通过 PSL 来推动棚改货币化,这项举措起初在消化房地产库存、推动房地产投资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后期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扭曲,特别是过度刺激了中国大量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之相较的是,在过去两三年,尤其是 2016 年的 9 月 30 号以后,国家对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调控非常严厉,大多数城市出台了限售、

限购、限价、限贷等措施,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结构问题非常严重。此外,PSL 支撑的棚改货币化,显著地刺激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投资与价格。但接下来如果思路不加以调整,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和风险,毕竟通过棚改货币化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是有一定的上限的,并且居民的自有资金、能借入的信贷额度以及国家通过 PSL 发行的货币规模都有限。

第三是在来自基建方面的风险。当房地产政策扭曲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时,基建投资也会陷入被动。2017 年是去杠杆真正打响了对地方政府投资实施严格限制的第一枪,尤其地铁建设领域,人口不满 300 万的城市不能投资地铁;但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刺激效应仍然大量传导到 300 万以下人口的城市,造成一定投资配置扭曲。所以现在希望引入新一轮的宽松政策存在两方面的约束:首先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面临结构性约束;其次现在的外汇储备与高点相比已减少 9000 亿美金,而且 2018 年上半年是 20 多年来首次出现半年度的经常项目赤字,这在宏观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并且短期较难看到明显反弹。

第四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风险。这类风险一方面加剧了当前的信贷萎缩,另一方面对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融资与投资者信心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下行压力。

二、目前宏观政策如何破局

在我看来,政策破局的核心在于城市化方面,即中国的城市化需要重新规划布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不难看出,中国近年来每一次的政策刺激拉动经济,根本上都是着眼于两方面——基建和地产,它们其实和中国的城市化都是高度相关的。

在过去几年,国家一方面限制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又对三四线城市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刺激。如果当前宏观政策要破局,则需要把政策的方向适当调整,让中国的优势变成更强的优势。并非中小城市不应该发展,但在给定有限的资源与政策空间以及明显的经济下行压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布局将尤为重要。我认为政策破局需要注重两个方面:第一,目前的 PSL 支撑的棚改货币化的方向要适度调整和改变,政府应该

像现在的美欧一样,公布一个非常明确的棚改货币化和 PSL 的退出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围绕着重核心城市、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增速已经非常低,年轻人口的绝对数量在逐年下降,教育水平在高速上升,现在中国的二线城市甚至部分的一线城市已经开始争抢人才,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会继续向大城市、向一二线城市流动。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更以市场为中心来配置资源,让市场来决定哪些城市应该发展,哪些城市不应该那么快速地发展,而不是说通过棚改货币化与 PSL 的办法由政府及其附属机构过多地参与资源配置。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必然会带动方方面面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消费、科技与研发等。

第二方面,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过去几年,尤其在 2015 年以前,我公开表达过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房子盖得过多的观点。但现在我认为,中国在有些城市房子盖得过多,但有些城市还是供给不足,比如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另外基建也是如此,政府应在在合理的地方盖合理规模的基建,尤其应更多倾向于大城市,这样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与乘数效应才会更高。

三、对汇率和房价的看法

在我看来,由于存在央行调控,短期人民币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波动。从明后两年来看,如果贸易战升级,出口下滑,不排除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当然央行也有可能为了继续维持国内信心,使人民币在较小的区间里波动。

过去两三年,不少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因为棚改货币化的推动,房价出现明显上升。但我认为,现在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接下来有可能进入一个进一步分化的阶段:在三四线城市不少地方房价可能会停止上升,甚至出现下行。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中分化也会加剧,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或核心地段房价可能比较稳定,如果限价政策开始放松,不排除该城市或地段房价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四、阿根廷、土耳其是否在重演冰岛的历史

目前的阿根廷、土耳其与之前的冰岛虽

然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是可比性不强。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起源于华尔街,起源于全球性的、平台型的投资银行,所以对全球的金融体系和贸易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但到目前为止,全球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日本与中国,各自的基本面都比较稳定。如果我们以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的金融中心为例,美国经济目前很稳定,华尔街的几大银行目前各项指标表现良好。因此,2018 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源自于过去几年这些国家放松了警惕,借了大量外债,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进入了加息缩表的周期。

如果要比较,这一轮阿根廷、土耳其这些国家遭遇的问题更像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但从目前风险爆发的规模来看,一方面我们要保持警惕,进一步关注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是十年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两者完全不可类比。

五、棚改货币化拉动了消费还是房价

棚改对实体经济的具体影响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讲:

第一阶段,PSL 制成的棚改货币化向实体经济中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存在一部分漏出效应,即资金并没有用来买房,而是刺激了消费,这部分消费来自棚改货币化资金的直接影响以及房价上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尤其在 2016—2017 年期间十分明显。这一阶段棚改货币化同时拉动了消费与房价。

第二阶段,一些因素自 2017 年开始发生了改变。快速攀升的房价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与投机,导致居民在拿出更多储蓄(部分来自于棚改货币化发放的现金)的同时,也背负了更多的借贷。虽然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漏出效应,但是因为棚改的新增资金规模相对以前有所下降,该效应相应弱化。与此同时,居民买房更加依赖外部的信贷资金,推动相应的住房贷款规模快速上升。截至 2018 年三季度,中国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经接近 25 万亿,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扬,利息支出也随之增加,其宏观影响也不可低估。所以在我看来,现在这个阶段棚改货币化在边际上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已经很弱了。